

多桑蒙古史

中華書局



多桑蒙古史

上册

中華書局

# 多桑蒙古史

(全二册)

[瑞典]多桑著

馮承鈞譯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9 1/16 印張·1 插頁·684,000 字

1962年6月第1版

1962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,001—2,100 定價：(9) 4.00元

統一書號：11018·345 62.4.京型

## 前 言

多桑(C. d' Ohsson)是一位著名的東方學家，1780年生於君士坦丁堡，歷任瑞典的外交官，1855年死在柏林。他精通突厥、阿剌伯、波斯及西方諸國的語文。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寫的。著者憑藉他的豐富的語文的知識，參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，對蒙古民族在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活動史實作出了詳細的敘述。全書出版(第一冊1824年初版全書四冊1852年出齊再版)以後，歐西各國盛行一時，獲得了資產階級歷史學界很高的評價，並為中西學者所廣泛使用。

關於中國蒙古王朝——元代——的歷史，我國有着極其豐富的文獻史籍。黑韃事略、蒙韃備錄、元朝秘史、聖武親征錄等書和明代官修的元史，都是研究蒙古史的頭等史料，其中元史更是記載蒙古王朝統治時期的中國歷史的最詳盡的巨著。這些史料早已為中西學者所重視。但是，十三、四世紀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有着世界性的意義，他們不僅統一了全中國，並且還遠遠地向西方發展，達到東歐各地，建立了察合台、欽察、伊兒三大汗國，給予這些地區各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以極大的影響。因此，全面地瞭解和研究我國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，西方文獻的參考是十分必要的。多桑的這部書以及這部書中所引用的著作，如刺失德、兀外尼和瓦撒夫的書，都是值得參考的資料。

這裏應該指出，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點的，除了譯者在序言內指出的史料編纂方面的錯誤和疏漏之外，主要的還是資產

階級歷史學者所共有的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。它只是比較有系統地敘述了一些歷史事實，而對於這些歷史事實却沒有也不可能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評判。但多桑這部書，正如馮承鈞先生在序文中所說的，在刺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、阿剌伯文的許多著作沒有譯出以前，還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。今天我們重印這部書的原因也就在此。

多桑的書卷帙頗鉅，出版百餘年來，全部譯成東方文字的只有馮承鈞先生的漢譯本。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譯本，僅完成了前三編。馮先生翻譯此書，因為上下兩冊分期譯完，有些譯名未能統一，他生前提起，每引為憾事。中華書局要求將先生的譯本整理重印，為了便利讀者，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願望，除了將兩冊的譯名盡量力求一致以外，並在後面增添了譯名對照等表。在今天中亞史料未能大量譯出之前，我想對於研究蒙古歷史的人，這部書會有一定的幫助。

陸峻嶺 1958年9月於北京

## 譯 序 (一)<sup>①</sup>

一部元史，歷來囿於“正史”成見的人皆說不好，所以陸續改編了些續編、類編、新編、譯文證補、蒙兀兒史記、新元史。這部歷史好像是犁然大備，其實不然。修史首重在搜輯史料，而修元史尤須要通曉幾種外國語言；不解外國語言，不但不能搜輯外國史料，而且不能解釋本國史料。更有進者，外國語言不可偏重一種，譯文證補就犯這種毛病。此書雖然引用了許多“西域書目”，好像他是全憑譯人口述而“筆受”的。不僅未見波斯語阿剌伯語種種撰述，而且多桑的書好像也是從霍渥兒特 (Howorte) 書轉錄的。洪氏證補元史之功固不可沒，可是他有一種成見誤人不淺，他說西方語言無某音，不及漢字譯音之備，此說很不可解。若說用標音字母譯寫的名稱，不及音義有變化的漢字之備，未免很奇。他在譯文證補裏面，根據譯人的口述，改了許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，比方元史譯 Heri 作也里，元朝祕史作亦魯，皆有譯例可尋，可是洪氏根據晚見的 Herat 譯作海拉脫，似乎祇知其一不知有二了。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。他這種創譯，苦了後來續修元史的人。所以新元史的阿兒渾，在此人本傳中作阿兒渾，而在旭烈兀傳同西域傳中又作阿兒袞；這種毛病皆是不能逕讀西書所致。

所以我想將多桑這部蒙古史翻譯出來，此書出版雖已有一百多年，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，仍不能不拿來參考，因為世界侵略者

① 這原是本書下冊的譯序。後面的一篇原是上冊的譯序。

傳、史集、瓦撒夫書等書沒有完全譯本以前，終不能不取材於是書。案多桑書共有七卷，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時的事蹟，後四卷專言伊兒汗國的史事，並附帶言及欽察察合台兩汗國。其第一卷業經田中萃一郎譯爲日文，譯文還忠實，可是有許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載籍的固有譯名比對。第二、第三兩卷記成吉思汗以後之事，然多取材於中國史書的譯文，所本的漢籍，以續通鑑綱目、元史類編兩書爲最多，偶亦採用元史。然而於元朝祕史、聖武親征錄等書皆未引用，當然說不上黑韃事略、蒙韃備錄同元人文集中的許多碑誌行狀家傳了。所以我譯此書，先從後四卷譯起，將來如有餘暇，再譯比較西方材料較多之第二卷。

多桑書所本之書有二三十種，也有人名地名不統一的毛病，尤其使人討厭的，就是他疊牀架屋式的譯寫方法，然而也無可如何，不使用新式譯寫方法將他改正。霍渥兒特書第四冊的索引譯寫單簡，可以取來對照。

我原想用白話翻譯，不用“史書文體”，可是漸漸不知不覺地受了史書文體的支配，然而我始終力避用“典”。我的目的惟在將此書原意譯出，供他人作史料參考之用，所以對於譯文祇求忠實，不去鍛鍊字句。在別人看起來，我譯的這部書或者比從前的譯文退步，然而我覺得譯文通暢的地方，容或有點削足適履；文義澀滯的地方，容或確可比對原文；所以寧願拖泥帶水，而不願鉤章棘句。

從前編纂元史的人，除開屠寄以外，皆有譯名不一貫之病；所以我在翻譯中，對於人名地名，頗爲審慎。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、元祕史兩書爲主，兩書所有的，選用一名。兩書所無的，地名一項，儘先採用唐宋明人的譯名；人名一項，元代載籍中有同名的，如帖木兒、不花、阿里、忽都不丁、阿合馬、亦思馬因、阿老瓦丁、馬合謀之類，雖非本人，亦用舊譯。元代載籍中無可比附的，則務求合乎元人的譯法，不敢以今人的讀音，認作元人的讀音。元人的譯法在不

明語學的人看起來，好像不對，比方將-l 讀作-n，就是一箇例子。殊不知這種代替方法，從前也有，而在元代竟成一種通例，所以譯 sultan 作算端，Djelal-ud-din 作札蘭丁，Iltchikadaï 作宴只吉帶。這皆是翻譯本書所用的正例，然而有時因為下述種種理由，不能不用變例。

元代除開一箇最短期間用八思巴字母外，始終用的是畏吾兒字母。畏吾兒字母中無代表 g-、h 的字母，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種寫法。唐時突厥語的莫賀咄，移植到蒙古語中，應讀若 bagatur，可是在蒙文元祕史中寫作把阿秃兒，則成 ba'atur；在元史中更簡作拔都魯，則成 batur。又一方面，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錄韻母，所以有許多名稱寫法不一，姑就此把阿秃兒一字而言，本書竟有寫作 Behadir 者，我當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譯，而將他改作八哈都兒。此變例一。

伊斯蘭教人的名稱，無所謂姓，加之名字相同，要使許多同名的人有別，所以在名後加一別號，如用職務官稱之類；再不能判別，則於名後註某人之子，如 Ibn Ali，猶言阿里之子之類；或者還要加上一箇地名，如報達人，朮外因（就是譯文證補的志費尼）人之類。然而也有無從判別的，所以我將這類的譯名，略為變通。如元史中的 Argoun，是種族名，是軍名，亦是人名，元史為判別這些名稱，將他寫作阿兒渾、阿魯渾、阿里渾、阿剌渾幾種寫法。我也仿照這箇例子，皆分別著錄原文於下，可是也有不能分別的地方，本卷中有三箇秃兒罕可敦（Tourkan Khatoun），究竟是二人是三人，無從知之，此種名稱祇好用一貫的譯法。此變例二。

本卷中有些譯名，看起來好像是變例，其實正是正例。比方欽察汗國侵入波斯的統將名喚 Nogai，譯文證補將此名譯作諾垓，其實此名也是蒙古時代的一箇通常名稱，與他同名的人，在元史中頗不少見。我們姑將元史的譯例來解說。元史（我所指的當然是未遭乾



隆校刊的元史)定宗后名喚斡兀立海迷失，就是西書的 Oğoul Gaimisch，可見海字對 gai。蒙古人的官號 Noyan，在元史中寫作那顏、那演、那衍，可見那字在元時讀若 no，對照起來，Nogai 應該譯作那海，而不應改作諾垓，這類例子很多，姑舉其一，以概其餘。

還有些譯名，可以說是正例，也可以說是變例。旭烈兀有箇兒子，在此書中(第五卷)寫作 Councouratai，譯文證補阿八哈補傳寫作空庫斡台，蒙兀兒史記世系表作空古斡台，新元史旭烈兀傳作空古斡兒，然在台古塔兒傳又作康廓而拉台，其實皆被多桑疊牀架屋的譯寫方法所誤。案元代的蒙古人，常用些部族名稱作人名，僅在後面加上一箇接尾詞，大概男名加“台”，女名加“真”。這些用部族名稱而自名的人，並不是本部族的人，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，並不是中國南方的人，馬扎兒台也不是匈牙利人，乃蠻台也不是乃蠻人，不過取其名而已。此處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。多桑所取的材料來源不同，寫法因之有異，其第一卷後附註所引史集諸部族名，有 Councarat，就是此人名之所本，也就是元史所常寫着的弘吉剌，此名在輟耕錄中作瓮吉剌，在遼史金史中作王紀剌廣吉剌，用新式寫法，應作 Qongirat 或 Ongirat。頭一字何以有時用聲母，有時不用聲母，我現在還不能答覆這箇問題，我們不能拿畏吾兒字母來解釋，因為遼金時代蒙古人還未用畏吾兒字母，可是第二箇字的韻母在漢譯皆用-i，所以我將這箇人名更正為弘吉剌台，這箇譯名初視之好像未遵原文，其實我有我的理由。

本書有若干地名，我明知有誤，然而未能確證其誤以前，祇好隨他。比方旭烈兀進攻木剌夷時，有箇地名作 Khar，按照霍渥兒特蒙古史所引 Quatremère 譯本史集，此地名是 Khowar，則即是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胡瓦耳。然而我不敢改正，仍然譯作哈兒。又如本書中之若干地名，似乎應該“名從主人”，不應用歐洲語言的名稱。比方埃及不應名曰埃及，而應名曰密昔兒(Misr)；美索波塔米

亞(Mésopotamie)應改作 Djézireh。可是我是譯書，而不是在考訂，所以也不便改他。然而有時也有點變例。阿刺伯語名阿母河曰 Djihoun，此河元代本有阿梅、阿母、暗木等譯，所以我習用舊稱，不用新譯。本書稱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，原意猶言“烏澗水外”，譯用這箇名稱，未免太僻；若用康居的名稱，未免太古。元時在此地設阿母行省，可是這箇行省所管的區域，好像在最初時西及波斯，東兼元史西北地附錄之途魯吉(Turki)，不能將這箇名稱代表兩河之間的地域。考此地阿刺伯語之原名作 Maveraun Nehr，此言河中，西遼時於其地置河中府(見湛然居士集及西遊記)。我所以將此地譯作河中，其地既在西域，決不致同蒲州發生混解。

譯名一貫之重要，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觀之，就可知道了。新元史卷 256 (12 頁)云：“西里亞，埃及屬國，以他木古斯爲都城，埃及與蒙古隔絕不通使命。憲宗初，西里亞酋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，後爲埃及蘇而灘哀倍克所敗，納昔兒乃割基納斯列母克渣及納蒲列斯海岸以請平。”案此處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，明明是一箇地方，不知爲何用兩箇譯名。此城就是我所翻譯的大馬司。此城古稱同現在英文仍舊襲用的名稱，固是 Damascus，然而我祇能從原書法文名稱之 Damas 而譯作大馬司。新元史的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，就是多桑書的 Nassir Salah ud-din Youssouf，我翻譯的納昔兒撒刺丁亦速甫。新元史的譯法，除開“商”字外，尚可勉強對付，可是後面的“基納斯列母”，要叫元朝的人讀起來，勢須作 kinasremou，同多桑書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遠了。況且這是基督教人的聖地，通常譯作耶路撒冷者，不知爲何發生這樣的訛譯，大約是翻譯的人太無史地常識，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對原文所致。由這一方面看起來，可見修元史不僅僅要通曉與元史有關係的若干語言，而且還要拋棄漢字古今讀

音不變的成見。其實我於此道不敢自認高明，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譯寫的蒙古文元朝祕史刊行後，考究元代的讀音，再就考究的結果，來整理元代載籍的譯名。那曉得等待了十四年，除開片段的發表外，全書尙未出版，所以於譯此書時，不敢自認譯音之必是，將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註原文於下；然不能遍註，祇以初見者爲限。有時一名兩三註者，或因原名有詳有略，或因一名寫法兩歧，或因前後文相距太遠，所以一再著錄。

讀者還要注意的，不僅多桑書所著錄的名稱不一致，或有誤寫而必須考訂的地方，而且他所本的史料，也不免訛奪。現在姑舉一例來說，史集記載從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，第二路經過一城名曰 Djodjou，此城附近別有一城名曰 Simali，後一箇名稱就是長城附近的洗馬林堡。可是 Klaproth, Yule, Blochet 諸人皆說前一地是涿州，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將就，在地理方面可就難了。現在從燕京到多倫西北八十里之古開平府，何至於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幾十里的涿州，足證刺失德 (Raschid) 書傳抄有誤。伯希和在亞洲報 (1927年刊) 說是撫州之誤，這種考訂是不錯的。可見不僅讀多桑書要審慎，就是讀他所本諸書的原文或譯文，也要審慎。本卷中所言的獅符，明明是虎符之誤，新修元史的人過於重視西方載籍，常將虎符改作獅符，然則元史兵志“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”的記載，竟成狗矢了。

1933年6月1日馮承鈞識

## 譯 序 (二)

多桑書共有七卷。我前以爲西域三大汗國的史事，在舊籍中頗欠缺，在新編中亦多疏誤，故先將後四卷逐譯。後來看見田中萃一郎所譯的前三卷，我又覺得全書仍有翻譯之必要（田中的譯文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評），遂又將前三卷轉爲漢文。翻譯時間既有先後，前三卷同後四卷的譯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Mohammed 先譯作謨罕默德，後在前三卷中概從唐譯作摩訶末，就是一箇例子。全書譯竣，我想將後四卷取回整理，不意原稿清樣統已製成紙型，勢須大加挖改，末後祇好聽他。前三卷有新式標點，後四卷無，也是因爲這種關係<sup>①</sup>。

我從前在第四卷序中說過，多桑書同元史一樣，也有譯名不一貫的毛病。因爲他所本的伊斯蘭教撰述，文字不著韻母，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，常易相混，所以不特相近的韻母有時誤用，甚至難於互用的韻母，也能混淆不分。聲母之誤如果無他書可以對勘，竟至無法考訂。比方主兒勤之誤作 Bourkines，錯了一箇聲母，那牙勤誤作 Boucakines，竟錯了兩箇聲母，一箇韻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難的，就是對於 c, k, g, kh, gh 等聲母毫無分別，例如他譯寫的 gan，對音可作干(gan)，又可作堅(gän)，且可作罕(ghan, khan)。這種困難有時還可以用前後文去補救，例如 Togan，不難認識是脫歡。可是他有時又將 o 同 ou 兩箇韻母互用，寫作 Tougan，則未免使人猶豫不決，因爲蒙古人也有名喚禿堅的。像這一類的困難不計

<sup>①</sup> 此次重印，已將前三卷與後四卷譯名加以統一，後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標點。

其數，我自信尙未能完全將他解決。

此外有些譯名，好像與對音未合，其實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證過若干變例，比方將 -l 讀作 -n，畏吾兒字母中無代表 g, gh 等聲的字母，就是兩箇大變例。此外尙有若干爲前序所未及的，條列如下：

突厥語發音之 y，在蒙古語中常變作 j。比方突厥語驛站作 yam，蒙古語改作 jam。突厥語法令作 yasaq，蒙古語則改作札撒黑(jasaq)。訛答刺城的守將，殺成吉思汗使者的那箇人，刺失德書名亦納勒出黑(Yinalčuq)，號哈亦兒汗(Qayir-khan)，而在元史則作哈只兒只蘭禿(Qajir-Jinaltuq)。除以蒙古語語尾之 -tuq 替代突厥語語尾之 -čuq 外，兩箇 y 皆變作 j，一箇 l 變作 n。這種例子舉不勝舉。

蒙古語同西域語常將 b 變作 m，若乞卜察黑(Qibčaq)之變作欽察(Qimcaq)，哈卜哈納思(Qabqanas)之變作憨哈納思(Qamqanas)，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

蒙古語對於發音之 r，常疊用其後之韻母，比方 Ros 之作幹羅思(Oros)，Riazan 之作也烈贊(Äräzan)，也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這種譯法同古譯相反，比方宋高僧傳卷三有阿儂真那(Ratnacina)，竟將發音的 R- 簡單刪了，大約是漢語同蒙古語無此發音，所以讀音或增或減。

發音之 A- 有時省略，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賽因，Abu Bäkır 之作不別，是見於元史的變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兒的後人 Abu Saïd 在明史中寫作卜撒因的。看這箇例子，足見收聲之 -d 偶亦變作 -n。但是這種變例的收聲不常見。

蒙古語尾之 -n 增刪無常。若阿勒赤(Alči)亦作按陳(Alčın)，河西轉爲合失(Qaši)，也可變作合申(Qašin)，月忽難(Yohunan)又可作月合乃(Yohuna-i)，這箇月合乃在元史卷 134 誤作月乃合，

諸本元史皆然，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實作月合乃，這箇名稱大概也是從突厥語轉販而來的，在蒙古語中則變作朮忽難(Juqunan)。

蒙古語常讀 t 作 d，比方將 tarqan 讀作答刺罕，將 tair 讀作答亦兒，就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這種讀法好像不是蒙古語所獨有的，從前漢譯 tarqan 曾作達干，Turküt 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說這些變例，不但是譯多桑書所應知道的，就是讀元史也是應該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譯寫的漢字，我很想適合當時的讀音。因為翻譯非漢語的人名，固然要求一貫，可也要注意當時的讀法。我曾說過，如要整理元史譯名，必須備具幾種條件：(一)要名從主人；(二)要瞭解西方北方幾種語言；(三)要明白漢字的古讀，尤要知道元人的讀法。從前整理元史的人，好像多未備具這三箇條件，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離不明。比較以前的整部成績，祇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微合第二第三條件，可是他常將元朝祕史的譯音譯寫近代西文地名：將契丹改作乞壇(Qitan)，還可以說是乞塔惕(Qitat)的單數；將波斯作珀兒昔阿(Persia)，也可勉強對付；可是將埃及作額只魄惕(Egypte)，而不用名從主人之例，作密昔兒(Misr)等類的譯法，未免過於刻舟求劍了。但是比較其他改修的元史，總算強多了。在學界種毒最深的，要首數元史譯文證補的譯名。洪氏絲毫不問上述的三箇條件，同元代譯名的那些變例，對於元史名稱妄加改竄：比方譯 Catchoun 作哈準，而不用元譯的合赤溫或哈赤溫；譯 Noqai 作諾垓，而不用元史屢見不鮮的那海或那懷，自以為新，其實錯了。古人翻譯，很明瞭漢字的讀音，比方聖武親征錄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將，譯名作三木合拔都，後又作三合拔都，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'atur，翻譯的人用“三”(古讀 sam，今粵人尙作此古讀)，照顧到第二箇字的發聲。這種譯法就是從前佛經的譯法，也就是元朝祕史的譯法，不像今人隨使用本人鄉土的方言，同似識非識的漢字，譯寫外國語言名詞之亂。所

以元史中的譯名雖不統一，除開過於省譯之名稱外，皆不難復其原名。至若元史譯文證補一直到新元史的譯名，能够還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標準譯字，多從元朝祕史，然而並不認定元朝祕史是一部完全不誤的譯文，其中也有些傳寫的錯誤。比方將你沙不兒 (Nisabur) 寫作亦薛不兒 (Isäbur)，將亦刺合 (Ilqa, Ilaqa) 寫作你勒合 (Nilqa)，可以說是音點不明，致有此誤。可是殺乃蠻王子古出魯克 (屈出律) 的地方作撒里黑昆 (Sariq-qun)，證以近來發現的蒙文祕史殘本，實是撒里黑豁勒 (Sariq-ğol) 之誤。如此改正方與蒲犁縣之土名相合。這類版本的錯誤，祕史中尙有不少，所以我雖採用此書，可不絕對盲從。

舊譯名除開過於省譯的名稱，像忽亦勒答兒 (Quildar) 元史作畏答兒的例子外，我皆盡量採用，決不自出心裁，妄易新翻。元代載籍所無之人名地名，而有舊譯者，則用元代前後之古翻，如隋唐之范延，明史之帖必力思之類，亦不別用新名，不用今讀之字譯古名，也不用古讀之字譯今名。凡原名初見者，皆附西文原名於下。可是對於多桑書所採乾隆時妄改的名稱，根本既有錯誤，西文譯寫之名除不誤者外，概從刪棄。好在多桑書的精華全在伊斯蘭教著作，他所轉販的那些漢籍副料 (以續通鑑綱目爲最多)，應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書所引刺失德書很多，而刺失德書同聖武親征錄並出一源。在刺失德書未直接轉爲漢語以前，我覺得多桑書是一部很好的參考史料。比方親征錄所載木華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、亦乞刺五部，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國一文，其中的火朱勒部，久之未詳其對音爲何，今觀多桑書，知爲 Qošiqol。然則親征錄原譯或是火失火勒矣。刺失德書 (Berezin 本數見此名) 說是每十人隊中挑選二人組織成的軍隊，此說頗類真相，因爲此字的字根是 qos，突厥語猶言雙也。此姑就以多桑書校正中國史錄而言。反一

方面說，也可取中國史料校正多桑書。茲舉一例爲證：多桑書第一卷第二章有箇部落，名稱曰亦勒秃兒斤 (Ilturkine)，後在附錄中亞部族表中，又作亦勒都兒斤 (Ildurkine)，檢元朝祕史卷六相對之文(葉本 31 頁)，王罕有箇使臣名亦都兒堅 (Idurgän)，後(49 頁)同一人又作亦秃兒堅 (Iturgän)，也是一名兩種寫法，姑不問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，要可以元朝祕史的名稱改正多桑書之誤。

我譯多桑書時，很想作一種互證的工作，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，可是費時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，恐怕幾年也譯不完，後來祇好譯而少證。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譯寫方法，除引用多桑原文外，皆用新法。因爲多桑書之疊牀架屋的譯寫方法太累贅，並可發生誤會。比方谷兒只王 Lascha，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誤讀作辣思伽，其實應作刺沙（承襲此人王位的魯速丹，就是刺沙之妹，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認清是何人，蒙兀兒史記誤作刺沙之甥女，新元史誤作刺沙之弟婦，大約是習於中國觀念，以爲祇有弟媳婦攝政，那有姑奶奶當權，是不特不明西史，而且並 Howorth 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）。若是用新法寫作 Laša，就不致於發生這類的誤讀了。我譯多桑書常想將他的譯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寫法無一定標準，有許多名稱很難判別，末了祇好聽他，僅在漢譯名中略爲變通。所以 dji 常譯作“赤”，而不作“只”。再者多桑的譯名皆作“法語化”，比方蔑兒乞惕已經是蒙古語表示多數的名稱了，應該寫作 Merkit，可是他寫作 Merkites，另外又添了一箇法語多數，弄成畫蛇添足。要是遇見一箇翻譯匠，一字一音地當作英文讀去，恐怕最博識的考據家也無從考見真相了。這也是讀多桑書應該注意的一點。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固然是 -t，元祕史寫作“惕”，可是因爲採用別的語言，或因他種原因，有時多數作 s,r,l，元祕史寫作“思”、“兒”、“勒”。比方南家思 (Nankiyas)、速勒都思 (Suldus)、巴魯刺思 (Barulas)，用



“思”而不用“惕”，札刺亦兒(Jalaïr)，塔塔兒(Tatar)，用“兒”而不加“惕”，撒兒塔兀勒(Sarta'ul 就是回回)，用“勒”而不改“惕”，皆可爲證。我還疑心有用 -n 字作多數的。晃豁壇(Qongotan) 的多數固作晃豁塔惕(Qongotat)，乞顏(Qiyān) 的多數固作乞牙惕(Qiyat)，爲甚麼乃蠻(Naiman) 不作乃馬惕(Naimat) 呢？元代固有乃馬台(Naimatai) 乃馬真(Naimajin) 的人名，這不過是蒙古語變化的屬格，不足證明他是多數。檢遍元祕史，竟未發現乃馬惕的寫法，不論單數多數，皆作乃蠻。要說乃蠻是數目字(此言八)，爲甚麼朵兒邊(Dorbān，此言四，亦是部族名)有朵兒伯惕(Dorbāt) 的變化呢？若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非比較阿勒台(Altaiques) 系語言不能得到答解。我所舉的這些例子，無非使人知道蒙古語多數不僅用惕，切莫仿效蒙兀兒史記，不但將蒙古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，而且將非蒙古語的多數，甚至將梵語的多數，一概變作惕。

我這些批評，並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見己長，不過是因爲有幾部書已經具有“威權”。我譯本書撰者 C. d' Ohsson 的名稱，不敢規規矩矩譯作朵松，而仍用舊譯的多桑者，也是受了這種威權的影響。這些具有威權的撰述，不能說全書皆好，當然有些缺陷，我無非指明這點缺陷，使參考的人不致沿襲其誤而已。除開此點以外，我以爲別烈津本的刺失德書未重譯以前，元史譯文證補一書是可以參考的，成吉思汗實錄、蒙兀兒史記二書，也是治元史的人離不開的佳作。

我譯此書也不敢說好。從前在評田中所譯多桑書一文中，曾經說過：“多桑書中錯誤散見，欲改之則與原文異，不改則與事實違，無論何人譯是書，終不免吃力不討好。”所以多桑書出版逾百年，尙無一人敢有翻譯全部的勇氣或傻氣。我今竟敢將此書全部轉爲漢語，祇望讀者諒我膽量之大，不敢望讀者譽我譯筆之工。

1934年4月10日馮承鈞識